我国高校响应国家科研诚信政策计量研究*

——基于 147 所双一流高校的分析

赵雅洁 [1,2]　冯凌子 [1]　杨晓 [1,2]　袁军鹏 [1,2]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北京　100049

摘　要：[目的/意义]高校是科技、人才与创新的重要结合点，切实履行高校主体责任是落实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关键。研究高校政策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响应情况，有助于从顶层设计层面评估高校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为各级政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过程]**本文运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构建了涵盖政策外部要素特征与文本内容信息的多维响应研究框架，实现了 147 所双一流高校对国家政策的响应现状分析，提出了政策调适方向。**[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大部分双一流高校政策较为完善，发文高峰均与重要国家政策相关；但政策响应存在一定时滞，响应水平也具有差异；负责响应的高校机构以学术委员会和研究生工作部门为主；面向各类责任主体的政策工具都以命令为主，但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呈现明显不均衡态势，且高校政策细致化和本土化程度仍欠缺。需在管理水平对齐、政策工具调配、从业队伍管理以及工作内容细化等方面进行调整，切实提升高校科研诚信治理水平。

关键词：科研诚信；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工具；责任主体
分类号：G311; G353.1

1　引言/Introduction

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也是科技创新的基石[1]。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完善高校科研诚信体系，我国不断加快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步伐，党中央及国家各部委颁布了数十条政策进行高校学风建设与科研诚信治理。但是，高校仍是科研失信事件的重灾区[2]，部分高校没有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原因之一。因此，十分有必要从响应上级政策的视角剖析高校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落实情况，提出政策调适方向。

已有学者对高校层级的科研诚信政策进行了探讨。1994 年 Steneck 根据 70 年代后制定的科研不端行为政策演变，发现研究型大学进展缓慢[3]，提出要审查科研环境并重视科研诚信教育。随后很多学者通过文献或案例分析了美国、澳大利亚[4]、巴西[5]、德国[6]等国外高校科研诚信制度，进行了发展历程与特点概括、关键内容归纳以及实践成果分析。国内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了我国 42 所高校的科研诚信教育状况，发现高校管理机构不统一、施教对象局限于研究生等问题[7]；还有研究从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角度，使用政策计量与归纳分析等方法，发现我国高校已初步搭建起科研诚信管理政策和工作机制[8]。对于国内局部区域内高校整体现状，有国内学者针对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发现高校仍存在主体责任履职缺失、科研诚信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诸多问题[9]。因此，各国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水平都尚在发展中，我国高校也积极投入科研诚信制度建设。

然而，目前研究较少有探究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响应国家政策的情况，高校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有无响应与响应水平如何的现状尚不清晰。针对高校响应国家科研诚信政策开展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高校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情况，从而深入了解高校科研诚信制度现状，发现治理措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撤销论文成因、趋势研判及其对科研生态影响研究”（项目编号：L2324112）支持。
作者简介：赵雅洁，博士研究生；冯凌子，博士，助理研究员；杨晓，博士研究生；袁军鹏，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Email: yuanjp@mail.las.ac.cn

施的优势与短板，进行更加合理的政策调控。因此，本文通过搭建高校政策与国家政策的响应对接框架，探讨我国高校政策是否响应了国家科研诚信政策，响应内容如何，从而探究高校责任主体落实是否到位，并挖掘高校现阶段主体责任落实工作的完善点与完善手段来提出有效对策建议，为我国高校切实落实国家科研诚信建设要求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

本研究旨在从宏观制度视角揭示高校科研诚信建设落实现状与不足。研究将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解决响应现状不清晰的问题，首先进行高校政策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判定，并对现阶段响应水平进行全面评估；二是针对对策建议无落脚点的问题，围绕响应现状挖掘出完善点，并提供相应的完善手段。为实现响应水平的全面评估，研究将采用双重视角，一方面从政策外部信息的角度进行响应特征量化，提供高校现阶段政策响应水平的客观数据；另一方面从政策内部信息的角度进行响应内容挖掘，深入了解政策具体内容与性质。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结合文献计量学、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法的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方法[10]，以支撑分析政策文献的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从而为高校科研诚信制度完善与责任落实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基于此，研究将使用高校发布的科研诚信政策作为响应依据，系统搜集并分析相关数据开展研究。

2.1 数据来源

据教育部 2023 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074 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 233 所[11]。由于双一流高校建设力量相对较好，各项制度体制较为完善，且公开数据较全，信息相对更全面准确，因此研究选择了 2023 年全国双一流大学名单中的 147 所高校为代表，将其发布的科研诚信政策作为研究样本。

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与《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学风建设等科研诚信信息是高校必须公开的内容。因此，本研究通过访问高校官网的学风建设栏目、研究生院或科技处等部门网站，遴选出由高校发布的科研诚信相关政策，收集了政策条目信息与文本，并以网络搜索方式补充了缺失数据，最终形成双一流高校科研诚信响应政策信息库。

截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由于未能在网上公开查询到 5 所高校的相关政策，因此本研究实际纳入了 142 所高校的 654 条政策开展分析。政策发布时间范围覆盖了 2002 年至 2023 年，政策文件涵盖了“学风建设细则”“学术道德行为规范”“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与“师德失范行为预防与处理”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等几大类。

2.2 研究方法与框架

首先，为解决高校对于国家科研诚信政策有无响应的问题，研究从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与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入手，依据政策间的参照关系，作为高校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响应判定；为进一步解决响应水平如何，研究利用政策外部要素特征与政策内部文本信息进行多维衡量。之后，为解决从何处完善响应现状的问题，研究基于响应水平分析总结现阶段不足作为完善点，为高校政策未来响应方向与政策制定提供合理建议，框架设计详情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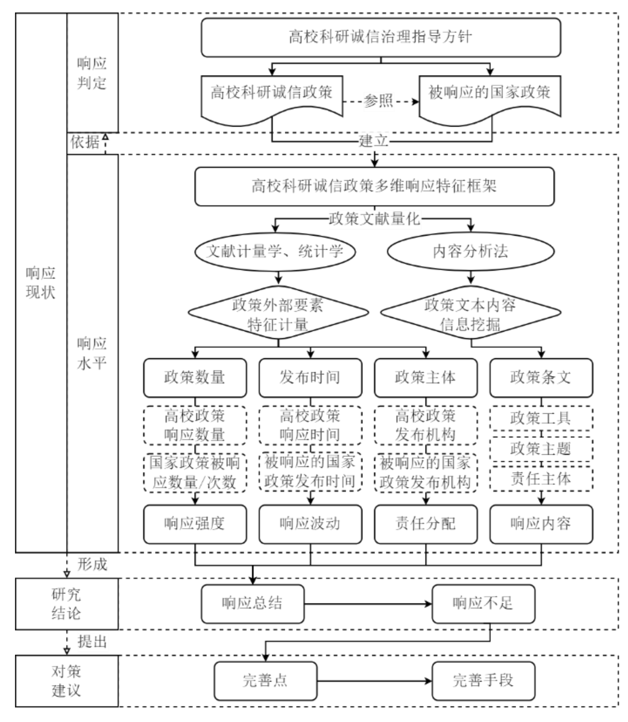


图 1 高校科研诚信策响应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Response

2.2.1 政策响应判定

关于高校的响应方式判定，主要依据高校与国家政策文献之间的参照关联。政策参照关联可以反映出政策意图的继承脉络，主要以“根据、依据、遵照”等为提示词，包括以政策文献内容形式呈现出的显性关联与以政策意图相似呈现出的隐性关联[10]。因此，研究将高校政策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关系分为显性响应与隐性响应，将正文中明确提及国家政策标题的高校政策判定为“显性响应”，而将未明确提及相关国家政策标题，但通过政策内容与意图分析出具有潜在响应关系的高校政策判定为“隐性响应”。

2.2.2 政策外部要素特征计量

政策外部要素特征计量在于反映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响应水平的外部响应特征，研究根据已有政策计量研究中常用的特征要素[12]，围绕政策外部结构要素“数量-时间-机构”为计量研究框架，衡量高校在各响应维度的趋势与差异。具体地，以高校政策响应数量与被响应国家政策数量反映响应强度、以高校政策响应时间与被响应国家政策的发布时间反映响应波动、以高校与国家政策主体分布反映响应过程中的责任分配、以高校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与责任主体的分布反映响应内容，共同组成“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多维响应特征框架”。其中，研究根据各类机构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将科研诚信政策主体划分为“立法-党政-落实”三类（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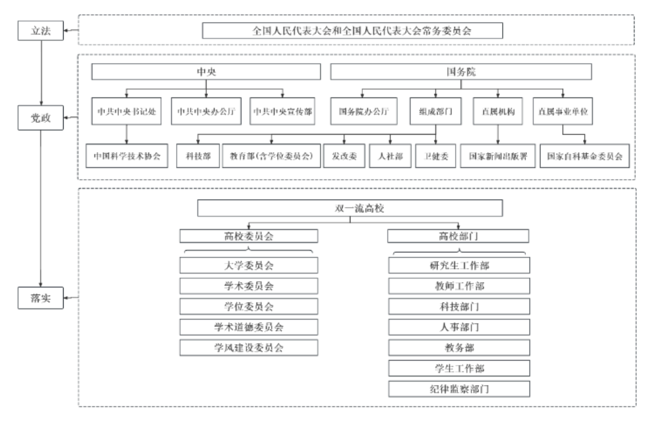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主体响应框架

Figure 2 Entities Response framework for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2.2.3 政策文本内容信息挖掘

为深入政策文本信息，反映高校科研诚信特性内容响应特征，研究以“政策工具-政策主题-责任主体”为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政策条文的分类编码与分词处理，分析政策工具与责任主体之间的交叉响应关系，以及不同政策工具下的内容主题，以了解现阶段高校科研诚信责任下沉主体与措施偏好。

（1） 政策文本分类

政策工具作为组成政策体系的元素，是政府为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13]。而政策则通过工具影响责任主体的行为，以达到既定的作用效果。基于科研诚信政策性质，并综合考虑各类政策工具体系对于理解政策、实践和效果之间联系的有效性，研究选择已有高校科研诚信政策研究[2]中采用过的 McDonnell 和 Elmore 提出的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分为“命令、激励、能力建设、权威重组、劝告”五大类[14]，各工具含义以及对应科研诚信政策的划分范围如表 1 所示。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科研诚信主题，研究使用了 Python 及 jieba 第三方库，对不同工具类型的政策条文进行了分词和频数统计，通过高频词提取反映政策主题。

表 1 政策工具分类范围表

Table 1 Scope of Policy Instrument Classification

工具类型	工具含义	划分范围
命令	管理个人或机构行为的规范以及违反准则的惩罚，具有强制性特点	学术道德规范，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规定、处理原则与处分等
激励	通过物质条件诱导目标群体快速做出期待的行为	对优秀集体和个人的宣传、表彰和奖励，失范行为举报奖励等
能力建设	通过资金转移来投资未来的物质、知识或人力资源建设，以更好地适应和执行相关政策规定	岗位职业培训、师德专题教育、学生学术道德课程等教育培训；为提升个人或机构的学术道德建设能力进行的资源投入等
权威重组	改变实施政策的体制结构，实现个人或机构的权力转移，提高实施效率	科研诚信相关机构或部门的建立、变革以及对组成设置、权力划分等
劝告	通过价值和信念传播，鼓励目标群体自觉调整行为，具有自愿性特点	对科研诚信行为的鼓励、弘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建议等

为进一步探究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研究将高校科研诚信责任主体划分为机构和人员两大类，分别是承担落实国家科研诚信政策主要责任的高校部门、高校委员会，以及科研诚信政策主要作用对象的全体人员、管理人员、教职工和学生，详细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校科研诚信责任主体分类表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Responsible Entities 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责任主体类别	划分范围
高校部门	纪检监察部门、教务处、研究生院、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等
高校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等
全体人员	针对大学师生员工、以大学名义从事学术活动的博士后、访问学者、进修教师等多类对象或未明确指定具体对象
管理人员	高校各职能部门人员、调查组人员等
教职工	高校教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等
学生	本科生、研究生等

（2） 政策文本编码

政策文本分类主要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以政策条文为基本单元，按照“高校编号-政策序号-条款序号-政策工具-责任主体”的方式逐条编码，实现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工具及其作用的责任主体的识别与归类。为充分保证准确性，需要对每条政策条款进行人工编码与核对，但高校政策数量较大，本研究集中对建设力量更为突出的 C9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进行编码，在排除 4 篇无法获取原文的政策后，最终纳入编码的政策样本 40 篇。之后使用 Nvivo11 软件进行编码，经过人工三轮编码校验，形成编码参考点。

3　响应现状/ Response Status

3.1　响应强度

据统计（表 3），147 所双一流高校共发布 654 篇科研诚信相关政策对 97 篇国家政策进行了响应，高校平均响应强度为 4. 45 篇，每项国家政策平均被响应 11 次。响应关系方面，456 篇政策为“显性响应”，共响应国家政策 1106 次，通过人工判读，189 篇高校政策被判定为“隐性响应”。响应强度方面，建设水平相对较高的 9 所高校（C9）发布 44 篇，其余 138 所双一流高校发布 610 篇，平均响应数量为 4. 89 篇和 4. 42 篇，两类高校在平均响应强度上没有明显差距，C9 高校响应数量相对略高。为了更全面分析高校响应情况与国家政策被响应情况，研究根据众数统计，发现每篇国家政策被响应强度集中在 6 次以下，高校政策响应强度集中在 4 篇左右。整体来说，大部分双一流高校发布政策较为完善，从学风建设、学术规范、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等不同角度制定了管理办法与规范，整体响应强度较高。其中，响应最强的长安大学发布了 12 篇，其从学风、师德、学术规范、查处办法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可见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比较到位。

表 3 不同类型高校响应国家政策强度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to National Policies

高校类型	高校数量（单位：所）	高校政策响应数量（篇）	国家政策被响应数量（篇）	高校平均响应强度（篇）	国家政策被响应总强度（次）	国家政策平均被响应强度（次）
双一流高校	147	654	97	4.45	1106	11.40
C9 高校	9	44	25	4.89	63	2.52
其他双一流高校	138	610	96	4.42	1043	10.86

在被响应的国家政策中（表 4），包含法律法规、规划文件、党内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其中被响应次数最多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初在 199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作为高校科研诚信教育的法律保障之一，共被 87 篇高校政策积极响应；其次是由教育部在 2016 年牵头颁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做出的规定[15]，得到了高校管理部门的重视，共出台了 85 篇高校政策进行响应。

表 4 被响应强度前 11 位的国家政策统计表

Table 4 Top 11 National Policies by Response Intensity

编号	发布年份	牵头部门	国家政策名称	被响应强度（次）
13	199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87
68	2016	教育部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85
36	2009	教育部	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74
44	2011	教育部	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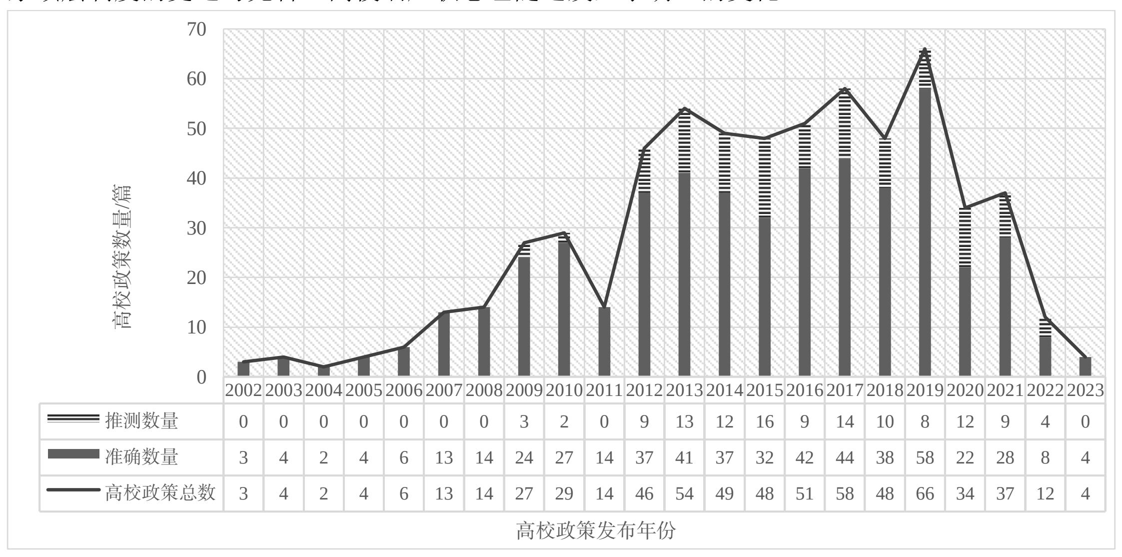
20	2002	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71
45	2011	教育部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51
59	2014	教育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46
40	2010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	44
2	198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38
8	199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34
76	20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33

3.2 响应波动

根据国家与高校发文波动，探索高校在不同时间阶段对国家政策的响应趋势与特征，从而发现引起响应波动的因素；并通过高校对国家政策的响应时滞，进一步探究高校响应速度特征，不仅能发现政策响应速度规律，还能进一步反映高校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视程度。

3.2.1 响应趋势

通过观察高校政策响应时间分布（图 3）与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出台时间分布（图 4），高校响应时间自 2002 年起，政策发布数量高峰均与重要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相关，高校政策发布曲线跟随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出台轨迹，均呈现整体上升、先缓后急的趋势。从 2002 年到 2023 年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科研诚信政策的政策环境、政策目标等都经历了很大的调整和波动，因此随着国家顶层制度的更迭与完善，高校响应状态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注：若官网未明确标注发布年份，则采用网页发布时间为推测年份，统计纳入该年推测数量

图 3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响应时间分布

Figure 3 Time Distribu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Responses

首先，在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初期，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建立明确的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2002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被响应 71 次）等基础学术道德规范文件出台。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在 2002 年至 2006 年五年间共出台 14 项，高校对此有所响应，出现小幅度增长，但各年总数皆在 10 篇以下，期间共出台 19 项；

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建立健全科研诚信规章制度，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高校科研诚信建设进入发展时期。2009 年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74 次）等专门针对高校学术规范与学术不端政策的出台。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在 2007 年至 2011 年五年间共出台 15 项，进一步促进了高校科研诚信建设进程，高校响应数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各年总数皆在 10~30 篇之间，期间共出台 97 项；

自 2011 年以后，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与十九大精神，反对不良学风、倡导创新文化，国家对于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引领全面提升。2011 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73 次）、2016 年《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85 次）等国家政策给予了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更为细致地指导，高校响应更为积极，各年度响应数量大多保持在较高水平。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在 2012 年至 2021 年这十年间共出台 49 项，2019 年国家政策出台数量最多（9 项），高校政策文件呈现大幅度增长，各年总数皆在 30 篇以上，2019 年发布达到峰值 65 篇，期间共出台 491 项。

然而，近两年发文均有所下降，考虑一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初步制度建设趋于稳定；二是因为响应具有滞后性，高校部分政策还处于计划中；三是由于网上公开数据具有不完整性，最新数据可能会有延迟。

另外，按发布年度划分被响应的国家政策，通过统计年度被响应次数和年度平均被响应次数，可以观察到国家政策被高校响应的年度特征。如图 4 所示，年平均被响应次数最高的是 1998 年的 87 次，该年只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这 1 项政策。从年度平均被响应次数分布整体看，时间越早的政策平均被响应次数越高，体现出政策响应的时间累积特征。但从年度被响应总次数来说，后续颁布的政策相关程度更高且更密集，高校响应更为积极。例如，2011 年发布的国家政策达到被响应总数的最高值 144 次，其中《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贡献了超过一半的被响应量；其次是 2016 年的 104 次，贡献较大的是《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可见，除了时间累积容易引起响应趋势波动外，与高校联系更加密切、与科研诚信主题更加相关的国家政策更容易引起高校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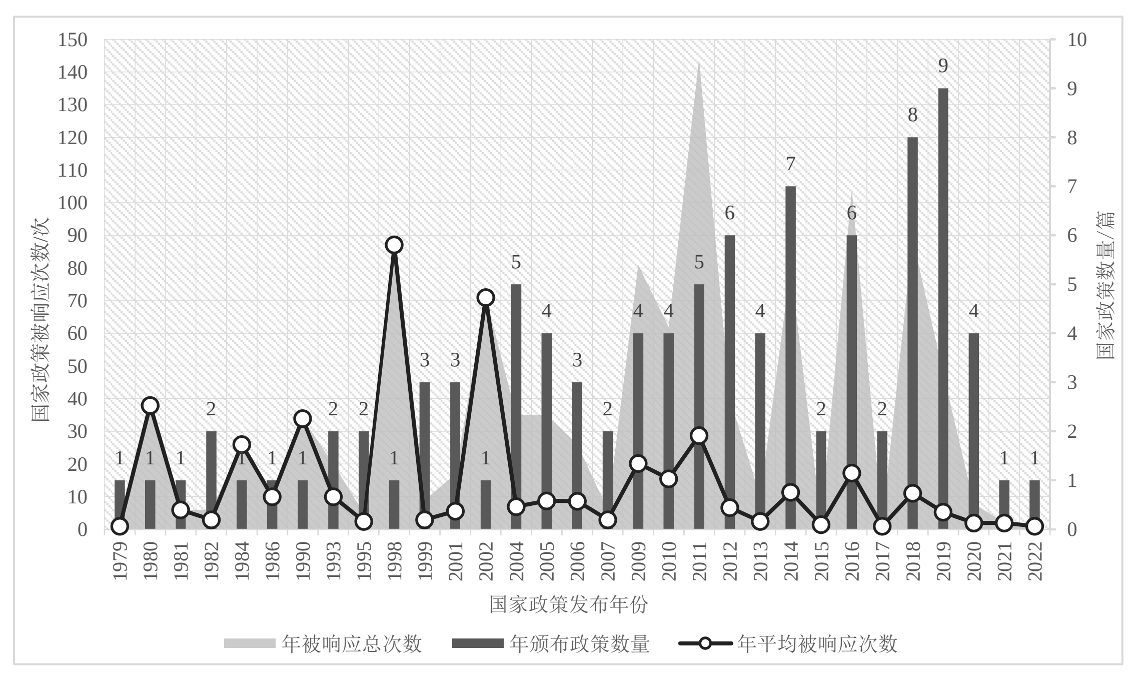


图 4 被响应的国家科研诚信政策出台时间分布

Figure 4 Publication Time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d National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3.2.2 响应速度

研究基于各高校政策与被响应国家政策的发布时间差，计算了国家政策的被响应时间跨度与平均被响应时滞，结果如图 5 所示，对角线表示该年国家政策被响应最长跨度与平均被响应最长时滞的参考线。可以看出，平均被响应时滞与国家政策发布时间大致呈现递减趋势，即发布时

间越晚被响应时滞越短，而被响应跨度则比较分散，即并非所有国家政策都能够被持续响应，会呈现出一定的生命周期。大多数国家政策的被响应跨度与平均被响应时滞都集中在 5 年内，即国家科研诚信政策一般在发布后 5 年时间内集中被各大高校政策积极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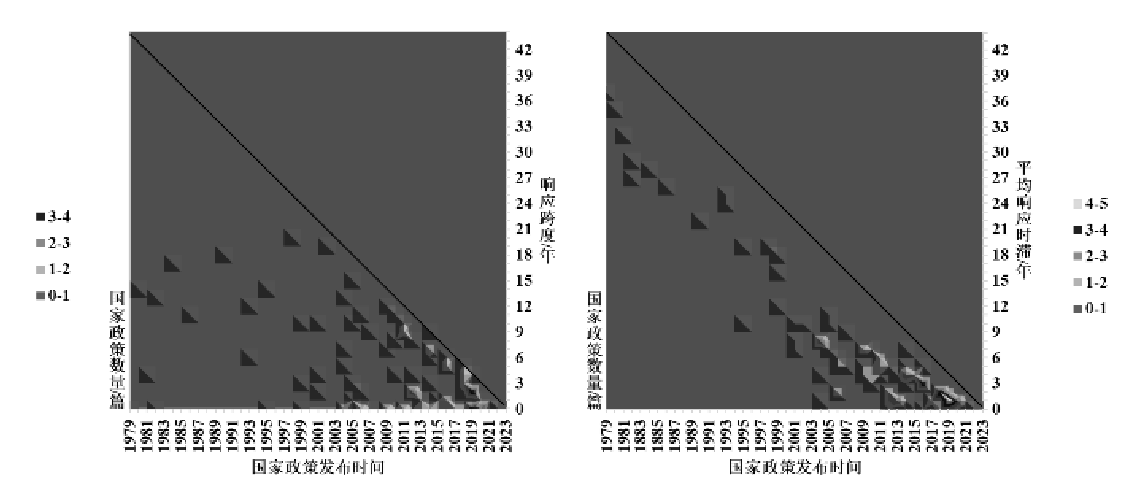


图 5 国家政策的被响应跨度与平均被响应时滞

Figure 5 Response Span and Average Response Delay of National Policies

其中，响应跨度最大的主要是出台较早的法律文件，其平均被响应时滞也相对较长，如 199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被响应跨度最长（跨度 20 年，平均时滞 19 年）；或者是早期主题相关的制度文件，虽然被响应跨度较大但其平均被响应时滞相对较短，如 2002 年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跨度 19 年，平均时滞 10 年）。整体来看，法律文件的被响应时滞相对更长，响应速度缓慢但被持续响应；而与科研诚信治理主题相关的制度文件，早期文件被响应跨度较长，近期文件被响应跨度较短，但整体平均被响应时滞都较短，体现了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延续性与一致性，同时说明高校对于该类主题相关、级别更高的政策更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尤其是近些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平均时滞 2 年）以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平均时滞 3 年），不仅被高校响应的强度高而且速度更快。

另外，研究从高校视角选择了响应强度排名前 15 的高校，依据其发布的政策与被响应强度排名前 15 的国家政策，以 5 年为一阶段建立时间轴，进行政策响应连线，并使用不同深度和类型的连线进行区分，结果如图 6 所示，左侧是被响应国家政策的发布时间轴，右侧是高校政策的响应时间轴。可见，不同阶段的国家政策都存在一定的被响应时滞，但政策响应主要发生在时间较近的阶段，但是相对重要的政策在各个时间段都会被响应。如 2009 年发布《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最早在 2010 年被响应，直到 2016 年还在被响应。而不同高校对于同一国家政策的响应也具有明显的时滞差别。例如 2002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相继被 2003 年《关于规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的暂行规定》、2006 年《四川大学学术道德规范》等响应，不过响应时间相近的政策，主题更加贴近。整体来看，前期响应较多的主要是法律文件，辐射范围最广，但后两阶段国家政策力度更大，要求更明确、具体，也更加聚焦于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因此高校出台政策更多，响应更为迅速和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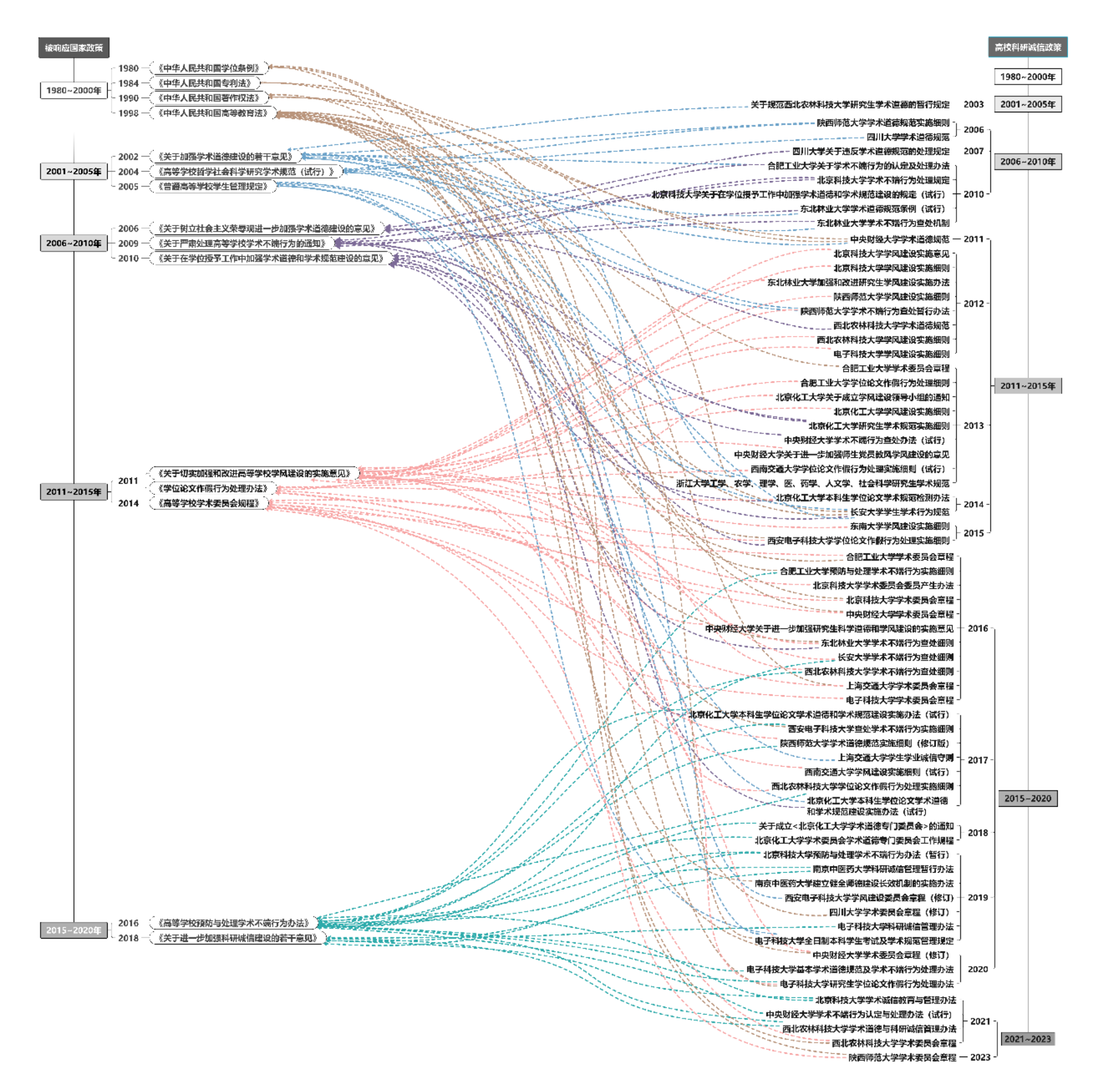


图 6 高校政策响应国家政策时间线图

Figure 6 Timeline of University Responses to National Policies

3.3 责任分配

基于我国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主体响应逻辑（图 2），研究分析了被响应国家政策的主体变迁，如图 7 所示，所响应的国家政策主体前期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主；中期主要由教育部、科技部牵头；后期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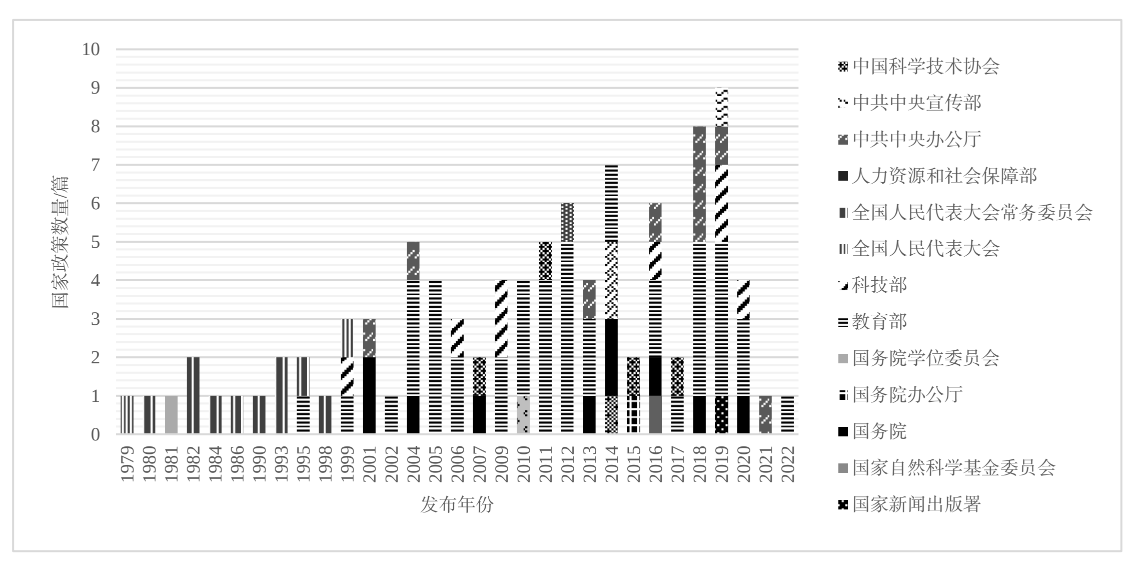


图 7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政策国家牵头机构

Figure 7 National Leading Agencies for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Policies

其次根据响应国家政策的高校发文机构，分析高校响应国家政策的主要负责机构，揭示政策落实过程中高校主体责任的分配情况。可见，在高校负责响应和落实国家政策的校内机构方面，主要是各类委员会以及职能管理类部门（图 8）。在各类高校委员会中，学术委员会作为科研机构行使学术权利的最高机构，也是科研机构学术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由学术委员会负责落实的政策最多。同时，高校研究生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最关键“结合部”[16]，研究生工作部门在各类高校部门中成为了落实科研诚信建设的最重要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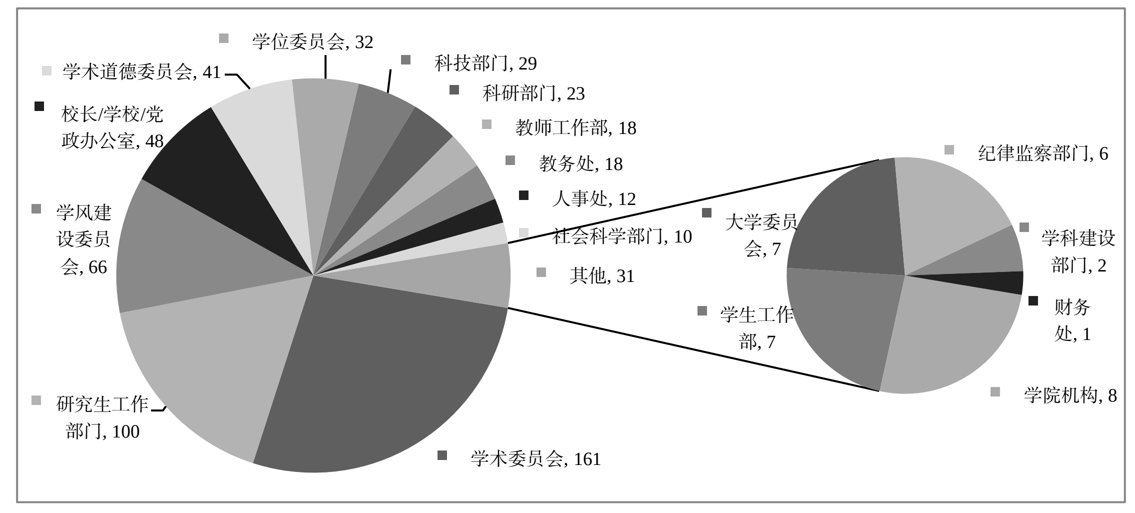


图 8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主体响应分布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Entities Responses to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从国家政策被响应的整体情况来看，高校积极响应的国家政策的牵头机构，一是颁布法律法规的立法部门，二是与高校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行政部门，三是与科研学术更为相关的协会或委员会。目前而言，高校科研诚信治理各级相关主体已经较为客观地建立了治理体系，发挥了教育、监督等作用。

3.4 响应内容

对 C9 高校发布政策从文本层面对响应内容的开展分析，共获得 3564 项参考点，政策工具类节点共获得 868 项参考点，责任主体类节点共获得 974 项参考点，图 9 直观地展示了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工具与高校责任主体间的交叉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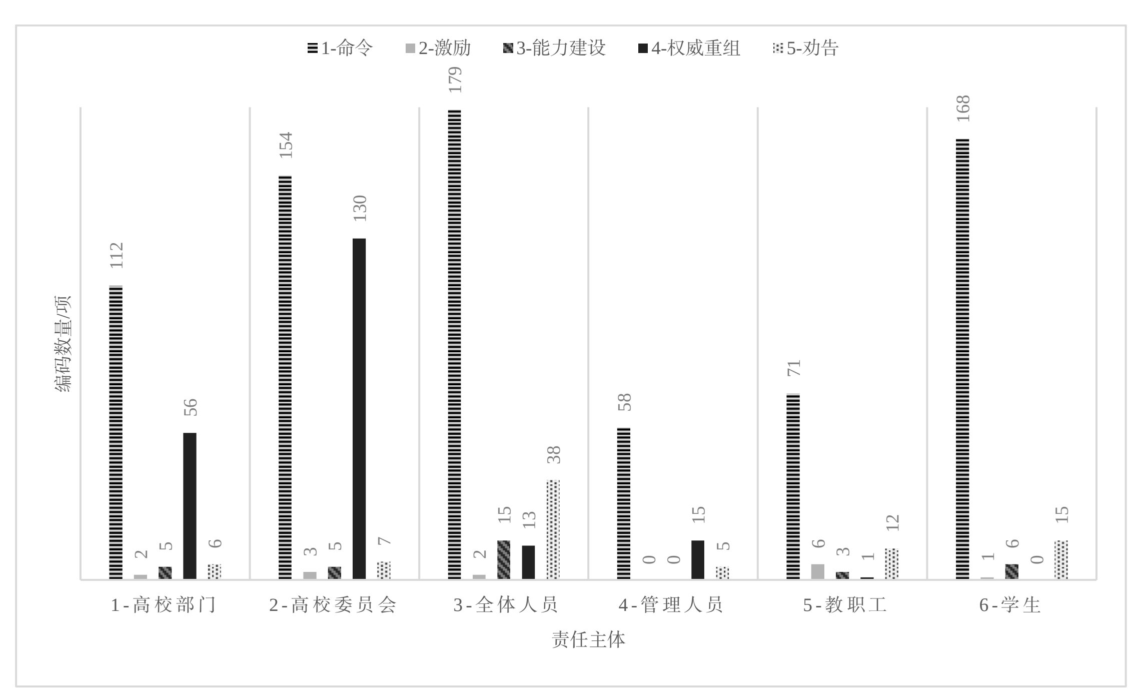


图 9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工具与责任主体交叉分布

Figure 9 Cross Distribu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Responsible Entities 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通过对比可见，政策工具的使用占比有较大差异，高校政策中使用最多的是命令工具（568，67%），由于科研诚信作为科研活动的底线，其规定大多属于强制性，高校在响应落实过程中无需对其界限进行程度划分等，要求比较明确，因此该工具操作更加简单，也最容易产生响应，主要的被命令主体是全体人员和学生，内容主题涉及调查处理、学位、论文成果、处分以及规范规定等；其次是权威重组工具（170，20%），由于上级政策一般涉及对下级机构的工作安排，下级政策在响应时会涉及到部门的废、改、立以及职责的定义、修改与分配等，该类工具更加直观与明确，相对更容易被响应，权威重组的责任主体主要是高校委员会和高校部门，内容主题涉及调查处理、举报、认定以及规范等；然后是劝告工具（65，8%），劝告具有非强制的性质，可以被命令工具代替，因此响应强度相对较低，劝告对象也主要是比较宽泛的全体人员，内容主题涉及决定、处理、申诉以及异议等；能力建设工具（28，3%）涉及教育、培训等，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全方位支持，因此响应强度相对也较低，但其作为科研诚信治理的重要内容，与激励工具相比响应积极性略高，主要对全体人员和学生开展，内容主题涉及学术规范、研究生教育以及道德建设等；最后是占比最少的激励工具（12，1%），主要面向的是教职工，由于激励涉及补助、拨款、奖励、福利等后续支持，操作更加繁琐且需要经费支持，不属于科研诚信治理的必要手段，高校对此类工具的响应积极性目前最低，现有内容主题涉及相关规定、处分以及师德等。可见，我国高校科研诚信建设主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并对权利与责任进行了重要整改，比较明显的不足是在能力建设与激励方面，主要还是依靠“规范”和“惩罚”等强制性措施来加快科研诚信落实。

在高校科研诚信责任主体中，排名前三位的责任主体在政策中的落实频次没有太大差异，依次是高校委员会（225，25%）、全体人员（216，24%）和学生（180，20%），其次是高校部门（140，15%），最后是教职工（82，9%）和管理人员（67，7%）。在各类责任主体的政策工具使用中，命令工具都处于第一位，面向高校部门、委员会和管理人员这类管理者来说，使用的权威重组类工具较多，而全体人员、教职工与学生这类实施者，使用的能力建设类占比略多，但整体数量不高。整体而言，落实高校科研诚信责任主体的分布比较均匀，不论是教研人员、学生、博士后等研究实施者（包括导师等研究指导者），还是高校部门、高校委员会、管理人员等科研诚信管理者，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政策覆盖，而学生和委员会作为实施者和管理者中的重要主体，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在落实中涉及该主体的频次较高，力度也相对较大。

将本研究的政策工具统计结果，与已有国家高校科研诚信政策研究结果[2]进行对照，可发现国家与高校政策工具分布大致呼应，命令最多，权威重组和劝告工具处于中位，之后是能力建设，激励最少。根据我国科研诚信建设要求，将科研诚信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对命令型工具有所侧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存在差异的是，高校所发布政策使用的权威重组工具相对更多，这一差异或许与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颗粒度与高校科研诚信建设需求的现状有关。国家层面对于权威重组工具的使用在政策层面更加细致具体，将主体责任划分为职责工作并分配到各个机构或部门，因此高校对此做出的响应则更加积极和频繁。除此以外，目前高校科研诚信建设亟待完善，高校为督促科研诚信政策地进一步落实，需使用更多权威重组工具进行具体权责划分，以提高工作的执行效率，从而有效支撑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建设。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并决定高校政策的响应状况，目前国家科研诚信政策在能力建设和激励方面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占比最低、颗粒度也相对较大，或许导致了高校在这两类工具上响应程度也相应较低。

4 研究结论/ Research Conclusions

经过分析发现，双一流高校整体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都能有所响应，并能够跟随国家建设进程进行一定响应调整。大多数都颁布了科研诚信相关政策进行责任落实，并向下分配到了相关部门和人群进行负责，初步搭建起了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框架。然而，现阶段各高校响应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管理手段与工作内容也存在一些待完善点。

（1） 高校响应国家科研诚信建设已有一定基础，但响应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研究分析结果，超过 63%的双一流高校发布了 4 篇及以上科研诚信政策，反映出我国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良好的基础，已经围绕大学学风建设、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等主题展开了积极响应，但是高校间的响应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众多高校中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相对较高的双一流高校，仍然有近 20%的高校响应强度在 2 篇及以下。并且有近 94%的高校政策对超过 93%的国家政策存在时滞，高校整体响应速度较慢。而其中有超过 30%的高校政策对 57%的国家政策存在 5 年及以上响应时滞，显示出了部分高校对政策落实存在较长滞后。可见，双一流高校内部响应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将这差异放大到全国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其响应水平差异将会更加显著，即各校科研诚信治理水平会严重参差不齐，“短板效应”将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继续横行，扰乱良好的育人环境与科研环境。

（2）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以命令工具为主，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失衡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以命令工具为主，权威重组和劝告工具为辅。结合政策文本响应现状，高校层面科研诚信政策存在命令型政策工具过溢，劝告、激励与能力建设政策工具不足的现象，尤其是现阶段国家和高校对于能力建设和激励的重视程度都太低，距离实现“激励有效”的制度规则还有一定差距。对于学术行为规范、机构工作规程、委员会与调查组人员资质以及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举报调查处理流程、违规违纪处罚等方面使用政策工具较多，但对于各类群体开展何种学术规范培训，切实提高其研究规范能力的政策较少。并且，对支撑科研诚信建设的人才资源、经费支持提及甚少，缺乏一定的激励措施来扩大高校科研诚信建设队伍，这将不利于组织架构的进一步完善。

（3） 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机制初具雏形，但对专业管理人员规定较为缺乏

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机制在制度规范体系、意识精神建设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基本框架和流程。目前处于搭建科研诚信机制建设的重要时期，管理人员作为高校科研诚信工作机制的中坚力量，承担主体责任下沉分配再落实的职责。然而，目前科研诚信专职人员缺乏，针对各类管理人员的政策条款相对较少，缺乏全面细致的政策引导和约束，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多为兼职或多岗，对

学术监督这一新型专业监督缺乏足够认识，。由于缺乏系统培训，这些人员在处理复杂的科研诚信问题时，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可能会影响工作质量，无法保障“监管到位”的工作机制[1]。

（4） 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已进行分类落实，但具体化与因地制宜程度仍显不足

虽然政策大方针响应效果较好，多数高校已建立专职机构与部门规章，并且在对教师和学术等科研人员在教育引导、监督约束和查处警示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现阶段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在制度规范、教育引导和监督约束等层面较为宽泛，大多数高校科研诚信政策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参照，但缺乏与高校本身的发展情况进行贴合，规定细致化与本土化程度不够，导致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距离实现政策目标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5 对策建议/ Recommendations

针对目前高校科研诚信管理中存在的特征与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进思路：

（1） 开展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水平监督，拔高对齐治理水平

针对各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响应水平中所反映出的治理差异，首先需要外部对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水平进行监督评估，及时发现导致差异存在的漏洞与短板，同时积极要求高校内部开展自查自省，自觉对齐管理水平较高的高校。整体上，提高高校调查研究、把握政策和推进工作的能力，加强对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响应，提高响应强度与响应速度，并联系自身特点，制定贴合环境需求、符合自身特色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实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科研诚信治理要求。

为更好地督促高校响应落实，拔高对齐各高校科研诚信管理水平，可以加强高层机构的管理与监督，新增国家级专职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建立区域分级机构体系，对高校科研诚信管理进行统一引导和监管，从而更加直接地打通科研诚信政策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落实各级机构责任。

（2） 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依据政策目标调整适配的政策工具

对于均衡政策工具结构性，可依据顶层政策目标进行调整。首先为实现科研人员诚信意识显著增强的目标[1]，可扩大使用能力建设工具，关注日常教育与加强重点环节培训，细化具体措施与实施对象。具体地①根据不同作用对象与环节，如学生课程设计、教师岗前培训、校园讲座与科技活动等环节，进行科研诚信教育日常引导，同时也要特别加强对学校领导、部门工作人员等管理者的科研诚信宣讲；②强化重点教育，在入学、入职、项目申报等重要节点，细化具体执行方案实现科研诚信意识强化；③及时关注科研人员成长需求，在项目申请、研究选题、方案设计、数据搜集、论文发表、作者署名以及后续资料留存等环节，加强指导培训，并形成规范化流程。

另外，为达成激励有效的科研诚信制度[1]，应投入更多的激励措施，扩大经费投入，设立科研诚信研究专项，并结合劝告工具，鼓励高校人员加入建设队伍，为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出谋划策，满足科研诚信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撑。而改善现阶段局面，不止需要高校倾注更多精力，更需要国家率先加大比重，并细化相关政策颗粒度。

（3） 完善高校科研诚信治理体系，加强从业管理队伍建设

关于高校科研诚信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从两方面入手：①组建专业队伍。鼓励高校通过招聘、培训等方式，利用重点研发项目打造一支受过专业培训、掌握专业知识的科研诚信治理队伍。推动学科交叉、靶向培育人才，支持具有法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充实科研诚信专员队伍。②汇聚有效力量。鼓励高校加强科研诚信治理交流，及时了解最新诚信建设动态、政策解读等信息，提高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借助专业智库力量，针对诚信治理工作中的难点开展咨询，汇集各方专业力量保障科研诚信治理工作开展。

（4） 完善高校制度架构，细化工作内容

解决制度规范、教育引导和监督约束等层面政策过于宽泛的问题，一方面应遵循上级政策指示进行细化落实，另一方面也应“因地制宜”采取符合本校具体情况的治理策略。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①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细化处理程序，保障措施合理合规、公开透明，及时公示失

信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接受公众监督的同时进行警示教育；②严格履行科研诚信建设职责，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切实发挥审议、评定、调查、监督与咨询等作用，全面提升各部门或组织执行效力。③落实科研诚信工作常态化管理，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细化，围绕责任机构、责任人、职责权限、工作细则等做出具体安排，使管理工作做到专人专事、有规可循，形成科研诚信管理工作共识。④完善校内外广大群众监督、举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失信事件惩处力度。

总之，高校对于国家科研诚信政策的响应落实对于我国科研诚信建设至关重要，高校层面应积极落实科研诚信建设，提高对国家政策的响应能力，并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在组织领导、制度完善、全流程诚信管理、严打科研违规行为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推动科研作风学风取得实质性改观，共同迈向完善的制度规则、清晰的工作机制、高效的信息系统、优良的科研文化和健康的社会生态[1]，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生态。

6　研究局限与展望/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本文以 2002-2023 年 147 所双一流高校层面发布的 654 条政策为研究对象，使用政策量化方法，对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与被响应的国家政策在数量、时间、机构以及内容层面，进行了响应强度、趋势、速度、内容以及责任分配的响应分析，并为下阶段高校科研诚信政策从管理水平对齐、政策工具调配、从业队伍管理以及工作内容细化等方面提供了调整策略。

同时，本文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高校研究范围有限，研究结果与我国高校科研诚信建设全貌可能会存在偏差；其次网上信息公开具有延迟性与局部性，现有政策收集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遗漏；另外在政策内容分析方面，目前聚焦了具有代表性的 C9 高校科研诚信政策，涵盖的政策内容仍需扩充；最后现阶段响应仅从顶层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展开，还未从实际操作处理层面进行实地调研，因此仅能实现顶层制度对齐，无法反映高校具体实施层面的微观响应。未来可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纳入其他非双一流高校，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高校科研诚信建设现状；对于可能存在的遗漏数据，按时开展政策跟踪、及时补充，尽可能保障后续研究数据的全面、完整；针对政策内容分析受限的问题，计划将来开展政策自动编码研究，减轻人工编码工作量，提高政策编码效率，充分扩大高校科研诚信政策内容挖掘覆盖面；最后尽快开展跟踪调研，设计更适合的研究方法探究高校政策是否落地，以期更加全面反映高校响应水平与治理现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 (2018-05-30)[2024-04-01].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5/30/content_5294886.htm.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Guideline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EB/OL]. (2018-05-30)[2024-04-01].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5/30/content_5294886.htm.)

[2] 温虹，贾利帅. 我国高校科研诚信政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 322(04): 48-54. (WEN H, JIA LS. Research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in china’s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J]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1, 322(04): 48-54.)

[3] STENECK 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misconduct - history, policies, and the future[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4, 65(3): 310-330.

[4] 陈嘉丹. 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制度的实施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CHEN JD.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system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D]. Jili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22.)

[5] ARMOND A C V, KAKUK P. Research integrity guidelines and safeguards in Brazil[J].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023, 30(3): 133-149.

[6] 李佳. 德国科研机构科研诚信建设的实践研究[D].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2024. (LI J.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n Germa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D]. Hebe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24)
[7] 袁子晗, 靳彤, 张红伟, 等. 我国 42 所大学科研诚信教育状况实证分析[J]. 科学与社会, 2019, 9(1): 50-62. (YUAN ZH, JIN T, ZHANG HW, et al. Empirical analysis on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of 42 Chinese universities[J]. Science and society, 2019, 9(1): 50-62.)
[8] 靳彤, 赵勇. 国内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进展研究——基于 2019 年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前 50 高校的分析[J]. 情报工程, 2021, 7(05): 87-99. (JIN T, ZHAO Y. Research on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integrity management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op 50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ranking’s best university in 2019[J].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7(05): 87-99.)
[9] 鲁焰. 高校科研诚信管理问题研究——以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为例[D]. 新疆: 新疆农业大学, 2023. (LU Y. Study on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university——taking the key universities for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as an example[D]. Xinjiang: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3.)
[10] 黄萃, 任弢, 张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 12(2): 129-137+158-159. (HUANG C, REN T, ZHANG J. Policy docum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 new direction for public policy study[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5, 12(2): 129-137+158-159.)
[11] 教育部.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1-16].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3 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bulletin[EB/OL]. (2025-01-16).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12] 杨正. 政策计量的应用:概念界限、取向与趋向[J]. 情报杂志, 2019, 38(4): 60-65, 51. (YANG Z. Application of Policiometrics: conceptual boundary, orientation and trend[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9, 38(4): 60-65, 51.)
[13] 赵筱媛, 苏竣. 基于政策工具的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7, 105(1): 52-56. (ZHAO XY, SU J.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ublic S&T policie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07, 105(1): 52-56.)
[14] McDonnell L M, Elmore R F. Getting the job done: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7, 9(2): 133-152.
[15] 教育部. 高校查处学术不端行为有章可依[EB/OL]. (2016-07-1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7/t20160719_272241.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universities on handling academic misconduct[EB/OL]. (2016-07-1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7/t20160719_272241.html.)
[16] 洪大用. 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EB/OL]. (2022-11-2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17/xxgc/xxgc_bt/202211/t20221125_1002992.html. (HONG DY.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EB/OL]. (2022-11-2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17/xxgc/xxgc_bt/202211/t20221125_1002992.html.)

作者贡献说明/Author contributions

赵雅洁：设计论文框架，数据处理与分析，撰写论文；
冯凌子：提出研究思路，数据收集，修订论文；
杨　晓：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修订论文；
袁军鹏：　指导论文选题，参与研究思路设计，修订论文。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Respons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National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147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Zhao Yajie[1,2], Feng Lingzi[1], Yang Xiao[1,2], Yuan Junpeng[1,2]
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Universities are a key nexu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talent, and innovation. Effectively fulfilling their entities responsibilities is critic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research integrity governance. Analyzing universities' policy responses to national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helps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universities are fulfill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rom a top-level design perspective, offer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y adjustments at various levels. ［**Method/Process**］This study employs policy literature quantification methods to develop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both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xtual content of policies. It analyzes the responses of 147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adjustments. ［**Result/Conclusion**］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ost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ve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with peaks in policy issuance coinciding with key national policies. However, policy responses exhibit a time lag and vary in their response levels across universities. The primary responsible institutions for policy response are the Academic Committees and Graduate Affairs Offices. Policies targeting different responsible entities predominantly rely on "command" tools, with noticeable imbalances existing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Additionally, the detail and localization of university policies remain insufficient, requiring adjustments in areas such as aligning management levels, allocating policy tools, managing the workforce, and refining work process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ity.

Key word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ometrics; Policy tools; Responsibility subject

*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Trends and Impacts of Retracted Paper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Ecology" (L2324112).
Author(s): Zhao Yajie, PhD candidate; Feng Lingzi, PhD, Assistant Researcher; Yang Xiao, PhD candidate; Yuan Junpeng, Researcher, PhD,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uanjp@mail.las.ac.cn.